

【高教研究】

论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及其演变

张侃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高深知识发展的自身逻辑构成了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科学主义的泛滥在将社会带入危机的同时也使知识自身的发展陷入了困局,学术权力也在这知识困局中产生了异化。我们只有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知识的发展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位才能消解危机,从而也让大学学术权力得以正常发挥作用,促进高深知识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高深知识

【中图分类号】 G40-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77-(2008)05-0039-03

纵观近些年对大学学术权力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学术权力概念的界定、本质的研究,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如何加强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的研究这三大方面^[1],而忽略了对大学学术权力自身合法性的讨论。这就使得我们对大学学术权力的讨论好似空中楼阁一般失去了基础与依据。因此,本文拟对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的审视,以期对当代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做一动态的考察与全面的分析。

一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2]。

根据韦伯的看法,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而所谓的正当性,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合法秩序的信念,以及行动受这一信念支配的可能性。韦伯在这种所谓“正当性”信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了权力的概念,并把权力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权力、感召的权力和法理型权力。传统的权力依靠“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实施权威者的合法地位的牢固信念”^[3],这种权力主要存在于古代社会,多是世袭性的,如封建社会中的皇权;感召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魅力,比如受某个人的人格、气质、涵养以及学识等吸引而心悦诚服地甘愿表示顺从;法理型权力主要是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权力,比如职权。

一、建构:对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分析

(一)何为合法性

要探讨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首先我们要明了什么是合法性。合法性是20世纪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因其基本观点和研究视阈关涉人类文明“秩序”如何维持和发展这一根本问题而受到学界关注。

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探讨。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有了这种合法性,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反过来,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它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所以,合法性的概念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对于处于命令

(二)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是什么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基本上理解了合法性概念的含义。那大学学术权力存在的自身合法性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对学术权力这个概念做一字面上的分析。学术权力这一概念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偏正短语,即“学术的权力”。那什么是学术呢?《辞海》把“学术”定义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问是指:“学习,问难。后通称各种知识为‘学问’”^[4]。张俊宗教授认为:“学术作为一种知识结果,与一般知识相比,学术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学术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只有揭示普遍意义的知识才是一种学术;二是学术是理性的而非感受的,只有出自人们理性思考的,并且有一定的系统性理论的知识才是学术;三是学术是高深的知识而非常识性的知识,当一种知识处于认识与探索阶段,并且有高深性,才属于学术范畴。而学术作为一种活动,反映着人们探索和发展知识、保存和应用知识、传播和延续知识的过程,与一般知

识活动相比,学术活动具有探究性、自由性、自主性和学科性四个特点。”^[5]由此,我们知道了学术既是系统性理论性的高深知识又是对高深知识的探求活动。再看权力,权力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不同的分析家对其有不同的界定与使用方式,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权力是一种力量或能力。概言之,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因此,学术权力就是拥有系统性高深知识和正在探求高深知识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强制力或影响力,更确切地说,学术权力就是拥有学术优势的人所具有的对他人的强制力和影响力。

通过对学术权力这一概念所做的分析,我们已基本上明确了学术权力这一概念的界定。学术权力是因“学术”而产生的“权力”。因此,其合法性的基础就是“学术”,即高深知识和对高深知识的探求活动。根据上文我们对合法性概念的分析,学术权力的这一合法性基础是如何被确认其正当性,得到了普遍认同,从而具有合法性效力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将学术权力放在大学这一大的框架下进行考量。我们知道,大学是探求与传播高深知识的场所。从历史上看,大学是在中世纪西欧社会城市机构化的过程中,波及社会各行各业的社团运动潮流之中诞生的,它最初就是一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人们之所以聚在一起,就是出自对知识和学问的共同兴趣与爱好,期望在相互交流、切磋的过程之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由此可知,大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以对知识的探求与传播为其目的的,而大学也从其产生之日起始终扮演着知识权威的角色,这种角色“并非是环境所塑造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自赋的角色。这一角色的逐步确立可以说既是大学能够得以长存于世的结果,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学精神传统以及文化个性得以形成并代代相传的原因。”^[6]可以说,大学存在的全部基础就在于其高深知识性,即对高深知识的占有、探求和传播,大学是高深知识制度化的重要表现。而对于高深知识的学习、探求和传播是要遵循高深知识自身发展的逻辑的,并且高深知识的高深性、系统性、理论性和学科性,使得对于高深知识的掌握与探求只有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才可以进行,一般的人是无法洞悉其中的奥妙的。同样,不同学科的高深知识的探求也具有不同的发展逻辑,相互之间也就无法完全了解,这就让以传播、探求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大学必须给予学者们以充分的权力与自由按照各自学科高深知识发展的逻辑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高深知识的不断发展积累,维护大学知识权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大学学者、教师们各自领域对高深知识的占有和探求的成绩,使其学术权力的正当性获得了同行与世人的认同与肯定。因此,可以说正是高深知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坚实基础。

(三)知识危机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异化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理性取代宗教神性逐步恢复了其主导地位,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从17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知识快速发展了起来,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也空前提高。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满怀激情地指出,科学的进步已经超过了17世纪之前人类所有知识的总和。

科学的进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论是一般的百姓还是社会的统治者,都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够告诉他们真理,因此也只有科学知识才能给他们带来福音。大学也正是在这次科学知识的大发展浪潮中摆脱了宗教神学附庸的地位和社会边缘人的角色,开始以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权威的角色进入了社会的中心,大学的科研职能得到了确立,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得到了强化,学术权力也得到了保障。

然而,一切的进步都是有代价的。自然科学知识将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促进了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但它同时又将人们陷入科学知识的牢狱之中,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就精神危机而言,自然科学知识按照知识的证实程度和逻辑一致性程度来判断其价值,将传统的人文知识都看作“非科学”的知识而加以拒斥,使其边缘化,导致了社会的知识结构失去了平衡,科学主义横行。人文知识和具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知识的缺乏,使得人们在社会财富空前增加的同时感到生活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迷惘。就社会危机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类欲望无止境的膨胀,人类丧失了对于自然的起码敬畏,以征服者的姿态从自然界中大肆攫取资源,自然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同样,科学主义盛行所带来的危机也使得以知识理性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大大学学术权力产生了异化。如上文所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强势主导地位 and 民众对其的高认可度使大学学术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但是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传统人文知识的排斥,使传统人文知识和具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知识的民众认可度下降,这就表现为在大学中的重理轻文,大学在科研资源分配上的厚此薄彼,在客观上限制了人文学科教师的学术权力。另一方面,在各知识领域(学科)内部,科学主义盛行使得大学建立在自然科学惟一真理性上面的学术权力的极大强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资深的著名教授手中,这少数人攫取了大部分的学术权力,占有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导致了事实上的对其他学者学术权力的侵害。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

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的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7]这样,学术权力的发挥就不再基于对于高深知识内部发展的逻辑,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事实上,这种学术权力已经异化为压制学术自由的“学霸”、“学阀”。无疑,学术权力的异化将极大地阻碍新知识的孕育和成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粗暴地对学术权力加以否定,而是应该从其合法性上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以找出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方法。

学术权力的异化是由于对其合法性基础高深知识中自然科学知识和实证理性的片面强调与夸大造成的。科学主义的产生和盛行成就了人类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的辉煌,但也同时将其带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是人类社会的危机也是知识发展的困局。在这种危机和困局之下,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以批判和解决人类现代性的危机和现代知识发展的困局为己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开启了心灵之锁,让我们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和未来发展全新的可能,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解构:后现代视阈下的大学学术权力

(一)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合法性危机与变革

对于上文阐述的知识困局与危机,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对其做了精辟的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在利奥塔看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各种尖端科技的变革都与语言有关。正是计算机及与之相关的信息语言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知识和科学领域的面貌。这突出表现在知识的信息化和商品化上。各个知识领域的话语现在都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用计算机处理的信息。“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8]。知识的信息化以其实际使用为目的,这又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和知识评价观念。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的关系越来越变成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语言转化成了多产的商品”,市场的投资和扩展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语言的扩展和投资。^[9]这样,知识的合法性和真理问题就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否带来效益。换言之,它们能否获得“正当性”的认可主要不在于是否具有客观意义或符合某种普遍理性的原则,而在于是否能转化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能否商品化。除此之外,科学发展中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如量子力学中的非连

续性)也使科学无法获得统一的认识,无法证实真理的合法性,而只能以其实际效用作为判断的根据。这样一来,科学的合法化标准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从而提出了重新解决科学以及全部知识领域的合法化的问题。

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其他知识领域,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对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等的追求的合法性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型等的肯定和崇尚。因此,利奥塔将知识和科学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归结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的使用不遵守某种确定的规则,认为规则只能由参与语言游戏的人彼此约定,是在语言游戏中自然形成的,可谓是一种语言习惯,而这种习惯只在参与语言使用的人中有效。人们在游戏中可以自由思考,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性,从而语言游戏也是个人实现自我的重要手段。由于参与游戏者在各自的自由想像中往往存在差异与歧见,彼此需要宽容、尊重,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偏见。由于语言游戏说否定游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强调其特殊性和差异性,认为在各个游戏之间,其使用的语句之间及其意义之间都不可通约,而这正是对元叙事、元语言以及一切与现代性相关的形而上学的否定。

(二)后现代视阈下的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分析

通过以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科学和全部知识的合法性变迁的分析,使我们对于高深知识的发展及其合法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可以说知识的发展已经由科学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文化知识型)转化。^①由科学型知识所确立的科学独断主义和对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与崇尚已逐渐变为一种对文化性知识的推崇,这种知识观注重个人的理解,认为没有“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知识,也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在这种后现代的知识观中,权威被消解,普遍理性被解构,认知特权被废除,“普遍的知识分子”消失和“具体的知识分子出现”。^[10]

这样,以高深知识为其合法性基础在大学学术权力也得被重新认识与评估。由于知识的生产和发展是多元的,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因此学术权力的产生和运用也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更加民主化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各学科知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大学内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于学术权力的掌握也应是一样的,知识只有类别的不同而无价值的差异。同样,在每一门学科的内部,

(下转第54页)

① 知识型指具有结构特征的知识形态,也可认为是知识的模型或知识的范式。石中英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上有四种知识形态,分别是原始知识型(神话知识型)、古代知识型(形而上学知识型)、现代知识型(科学知识型)、后现代知识型(文化知识型)。现在我们正经历着由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的转变。参见: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0-84.

三、启示

通过探讨目前我国西部农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与对策,也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西部农村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如此困难不仅是西部农村学校受中高考制度制约的影响,还有家庭、社会等一系列因素,西部农村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第二,研究者除了高瞻远瞩外,还应深入调研。要想使我国西部农村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取得新进展,不能仅满足于宏观层面上的高谈阔论,而必须深入到实践的微观层面上,坚持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尤其关注西部农村素质教育实施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第三,一项课题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途,最根本的是由课题自身蕴藏的问题决定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7]目前我国西部农村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大量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西部农村素质教育仍然具有研究价值,仍然呼唤大批有责

任感、有良知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西部农村教育工作者也应站在我国教育发展、民族振兴的高度,克服重重困难,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而实现我国农村教育的大跨越。

参考文献:

- [1]孙孔懿.素质教育研究之研究[J].教育学,2007,(5).
- [2]姚琳琳.关注年轻教师心理健康问题[DB/OL].<http://news.qq.com/a/20061224/001407.htm>.2007.1.9.
- [3]王嘉毅.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困难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6,(11):25-28.
- [4]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1):23.
- [5]杨太清.实施素质教育评价,促进学生和谐发展[J].中国教育学刊,2007,(1):3-7.
- [6]中央教科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R].天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1.
- [7][英]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7.184.

责任编辑:刘升芳

(上接第41页)

资深教授和年轻教授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关系,因为知识的发展是多元的,是有特殊性、差异性的,并不因为老教授资历深就一定具有更高深的知识和掌握绝对的真理,在对高深知识的探求方面,在对学术权力的掌握方面应是一样的。从生理上说,年轻研究者更具有精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他们的知识架构更新也更趋合理,所以要更多地鼓励青年教师和研究者在高深知识探求之路上快马扬鞭。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后现代知识型尚未在社会的知识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尚未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大学的学术权力也大多还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知识型的基础之上,产生了诸如轻文重理和学阀、学霸等上文提到的现象。但是,我们相信,后现代知识型或文化知识型完全替代现代科学知识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后现代的知识型更符合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更能满足所有人的知识需求。同样,我们也应自觉地树立以后现代知识型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学术权力观,学术权力的行使以通过民主方式获得的学术共识为出发点,以公平、平等为原则,促使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合理地发挥作用,从而真正起到保障学术自由,促进高深知识发展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 [1]赵俊芳.近20年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研究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7,(5):44-48.
- [2]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3):63-68.
- [3][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82.
- [4]辞海(1989年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1269.
- [5]张俊宗.学术与大学的逻辑构成[J].高等教育研究,2004,(1):6-11.
- [6]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6.
- [7]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2004,(1):89-92.
- [8][法]利奥塔,岛子.后现代状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31.
- [9][法]利奥塔,谈瀛州.后现代与公众游戏——利奥塔访谈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0.
- [10]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84.

责任编辑:乔健